

中国改革报

传播力就是竞争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公报发布报纸
全国独家信用信息公示信息披露指定报纸
本报发布企业债券公告



改革网



中国改革报微信

从“店老板”到“店小二”

从“管理者”到“服务员”，基层政府角色转变，成功破解企业痛点

□ 赵宇飞 姚雨霏

看着车间内紧张忙碌的生产线，重庆捷力轮毂制造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黎国全清晰记得，去年年初企业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幸好县里的“垫小二”平台及时伸出援手。

“垫小二”是重庆垫江县去年年初依托数字技术自主研发的企业服务平台。“垫”是“店”的谐音，“店小二”的背后，是基层政府从“管理者”到“服务员”的角色转变。

“去年上半年，受疫情冲击，公司外贸业务严重下滑，资金周转非常困难，企业面临倒闭危险。”黎国全说。危急时刻，公司收到“垫小二”平台的优惠政策推送和退税辅导。

“垫小二”平台为企业提供政策在线、普惠融资等重点服务。垫江县税务局依托“垫小二”平台，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帮捷力轮毂办理退税，公司在疫情期间的单笔出口退税，仅用3个工作日就办理完毕。

“这在生死关头拉了企业一把。”黎国全感慨地说，去年公司出口退税累计超过2000万元，享受各类税收减免2300多万元，不仅转危为安，出口订单还逆势增长37%。

垫江县委书记蒲彬彬介绍说，平台依托大数据为企业“画像”，将优惠政策分类精准推送到企业，并在线提供解读辅导，破解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

数据显示，“垫小二”平台已对50余项重点政策配套上线政策内容、流程申报、资料要件等政策兑现服务。去年以来，平台已为企业新增减税降费2.81亿元，惠及市场主体1万余户。

不仅是“政策在线”功能，“垫小二”平台还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痛点，推出普惠金融服务，在疫情期间挽救了不少企业。

“无担保、无抵押、利率低，且资金到账迅速。”蒲彬彬说，平台将企业授权的生产运营数据，与政务、金融机构数据汇聚，构筑以纳税信用、履约诚信、经营行为等指标为主的新型信贷量化评

估体系。

重庆优非特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受益者之一。去年初，公司流动资金短缺，复工复产困难。紧急情况下，公司负责人王庆在“垫小二”平台提醒下申请了一笔150万元贷款。

“我们在平台申报后，两周之后资金就到账了。”王庆说，资金到账后，公司迅速复工复产，成功渡过难关。

数据显示，去年6月以来“垫小二”平台已帮助182家企业获贷1.05亿元。

在此基础上，全县1019名干部化身线下“垫小二”，对口帮扶千家市场主体，通过走访收集建立企业诉求问题清单，依托“垫小二”平台实现诉求问题精准快速办理。数据显示，2020年，垫江县新设企业逆势增长57.4%，增速位居全市第二位。

如今，在我国不少地方，基层政府之于企业，正在实现从“店老板”到“店小二”的转变。

比如，在受疫情冲击较大的湖北省，去年6月印发《弘扬“店小二”精神“十必

须十不准”》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大力弘扬“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店小二”精神，将营商环境打造成疫后重振、浴火重生的金字招牌。

其中，“十必须十不准”涵盖政务服务事项、涉企收费、涉企会议调研组织、涉企监管、涉企检查等方面。

在浙江等沿海地区，政府部门发扬“店小二”精神早已付诸行动。这里既有“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一次办结”的企业“最多跑一次”改革，也有基层政府干部化身访问困难、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店小二”，为企业提供上门服务。

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中，中国营商环境排名跃居全球第31位，比去年提升15位，已连续两年被世界银行评选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

“企业的背后是数以万计的就业者，基层政府创新治理策略，优化营商环境，不仅为企业纾困，最终也保护了职工的劳动就业权利。”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研究员丁鹏说。

改革时评

袁隆平留给中国种业的“种子”

□ 乔金亮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日前在湖南逝世，包括种业工作者在内的人们纷纷缅怀。袁老说过，“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如今，他走了，却将创新与奋斗的“种子”留给了后来人。对中国种业来说，要从他身上汲取智慧，以“顶天立地”的姿态，持续推进种业创新，加大种业科技推广，最终打赢种业翻身仗。

袁隆平给我们水稻育种以信心，但我们不能骄傲，要正确认识我国种业现状。尽管水稻和小麦育种是我们的强项，但要看到玉米、大豆竞争力还不够强。尽管外资企业占我国种子市场份额只有3%，进口种子占全国用种量只有0.1%，但要看到个别蔬菜、白羽肉鸡等种源都不同程度地依赖着国外。尽管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超过75%，但看到商业化育种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种业创新与农业生产在某程度上还是“两张皮”。一句话，对比种业发达国家，我国种业仍处于上升期。

其实，现代种业发展的时间很短。以2000年种子法实施和“种子工程”启动为标志，中国现代种业才算真正诞生，并用2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历程。成就举世瞩目，但形势也很紧迫。当前，种业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观察国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对种业提出更高要求，既要高产高效、又要绿色优质，迫切需要一个大的突破。放眼全球，种业兼并重组已经完成，形成了三大巨头。世界种业正迎来以基因编辑技术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随着种业外部因素不确定性增加，种业“卡脖子”的弊端日渐显现。

种业“卡脖子”弊端，并不是说我国育种的基础研究不足，更多指的是育种的组织方式不优。我国育种人员数量和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一，科研实力属世界一流，但出大品种的能力却不是世界一流。长期以来，科研单位埋头搞科研，主要聚焦发论文、评职称、做课题，缺少产业化的精力和能力。而种子企业普遍小、散、弱，多数只负责销售、推广，没有科研的实力和能力。对比国外，我国相关企业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创新人才大多仍在科研院所。

可见，种业打翻身仗，不仅是品种应用上的翻身，更多的是技术创新上的翻身。新品种选育要靠很多育种材料经过上千次的组合，历时多年才可能成功，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没能培育出一个品种。育种是个小概率事件，只有技术优化、基数大了，选育成功的机会才会大。当今世界种业强国已进入“常规育种+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育种4.0时代，我国大多是经验育种，处在以杂交育种为主的2.0时代。以基因编辑技术专利为例，美国申请1070件，我国申请700余件。表面上看，有数量差距但不是很大，可关键是，我国申请的相关专利大多是处在技术体系的中间层，缺乏顶层核心技术和底层落地技术。

突破“卡脖子”、打赢翻身仗，要做到“顶天立地”。“顶天”，就是掌握原始创新、走在科技前沿，在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重大品种培育方面取得突破。“立地”，就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送到农民手中，不断把试验田里的产量变成农民地里的产量。“顶天立地”的核心要义是鼓励科研人员为企业育种，到企业育种、同企业育种，让企业成为商业化育种的主体，成为种业创新的主体。袁隆平领衔的杂交水稻的成功同样离不开与科技协作、产学研合作。因此，要推动育种资源、人才在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合理流通、协同发力。科研人员就像一颗颗螺丝钉，选育什么样的品种，要由种子企业成立品种委员会，讲究团队协作和资源需求，综合市场需求、产业需要等因素来确定。

当有了一个知名的育种家，当一批批有影响力的种企脱颖而出，中国种业才能迎来高光时刻。



新县 新貌 新生

河南省新县地处大别山腹地，是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是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的中心地，是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落脚点。近年来，新县依托红色资源和绿色生态，打造“红色乡村”旅游点，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山区变景区、民房变客房，实现了风景向收益的转化。2020年，全县共接待游客926.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9.3亿元。图为新县田铺大湾。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图说新闻

“数字”赋能贵州

近年来，贵州发挥地质结构稳定、气候凉爽、能源充足等优势，大力建设南方数据中心示范基地，吸引了包括苹果、华为、腾讯、FAST等公司或机构的项目落地，投运及在建重点数据中心23个。

贵州是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大数据发展推动政务、商用、民用多个领域，给当地民众生产、生活方式带来显著改变。5月26日-28日，2021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阳举办。图为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园。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皓首不忘初心 夕阳余热争辉

——访原国务院东北办副主任宋晓梧



□ 本报记者 付朝欢
□ 实习记者 安宁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记者在国家发改委的一间办公室见到了宋晓梧。一场采访下来，“劳动经济”“社会保障”“振兴东北”，是他求学和工作历程中绕不开的关键词。

宋晓梧，原国务院东北办副主任。在职期间，他在统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公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宏观经济分析、振兴东北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改革的很多焦点问题上，他都有独到的见解，并多次参与重大学术理论探讨。

当记者请他谈谈这些年的行政工作中一两件特别值得回忆的事情时，他毫不迟疑地回答：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资源枯竭型城市棚户区改造。“这两件都是‘雪中送炭’的工作，我是尽职尽责落实中央指示精神，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可算聊以自

慰。”宋晓梧说。

“党拥有强大的自我更新的生命力”

采访伊始，宋晓梧从最近看的一部热播剧——《觉醒年代》打开党史学习教育的话题。

“这部剧讲的是为了使中国走出百年积贫积弱、受人欺辱的状况，革命先辈如何以天下为己任，寻找解救中国的真理。最终认定马克思主义道路，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宋晓梧感慨，建党10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绩，是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取得的。

“毛主席曾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宋晓梧说，正是因为走了这第一步，才有新中国成立后更多的探索。

他回忆道，上世纪70年代，自己在工厂当工人，那时家庭人口平均每月生活费低于8块钱，工会才给补助。当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200美元，计划经济、全民所有制是大家心中社会主义的标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我国修

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之后又汲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解放思想，创造性地探索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1.12万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4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证明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宋晓梧表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飞跃，是认识上的巨大飞跃，也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探索，更为世界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即使如此，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然有完善的空间。”宋晓梧指出，经济高速发展也积累了一些问题。比如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改善受到损害的生态，以及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等。

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追求高速度发展转向侧重高质量发展，这是发展思路上的重大改变。

“无论是武装夺取政权还是和平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党都经历了重大挫折，同时又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体现了我们党拥有强大的自我更新的生命力。”宋晓梧表示，任何事情都有阶段性，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要有转变。面对出现的新问题，党能够通过民主和科学决策，不断自我修

复、自我前进，这是我党珍贵的品质。

“那真是一个解放思想的时代”

社会主义是否应承认存在失业？“劳务市场”是否应更名为“劳动力市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应不应该搞双轨制？是否只有GDP增长8%以上才能保就业？区域协调发展的度量指标是否是人均GDP？……这些现在已经得出答案的问题，都曾被激烈地争论过、修正过。而这些重大问题都有宋晓梧参与的身影。

研究生毕业后，宋晓梧服从组织安排，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既当过原劳动部国际劳工研究所副所长、原中国劳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也担任过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党组成员兼秘书长和原国务院东北办副主任。这些经历决定了他很长一段时间在学术研究和行政工作之间轮转。

学者和政府官员，这是宋晓梧参加工作几十年来，最重要的两个身份。宋晓梧坦言，这种工作经历的有利之处是，便于把改革理论探讨与改革实践工作相结合，不利之处是两者兼顾总有为难之处，尤其是个人学术观点与上级领导精神有出入时。他笑言，自己总是改不了当学者的那份“倔”劲，有机会参与理论探讨时，总会发表个人见解。